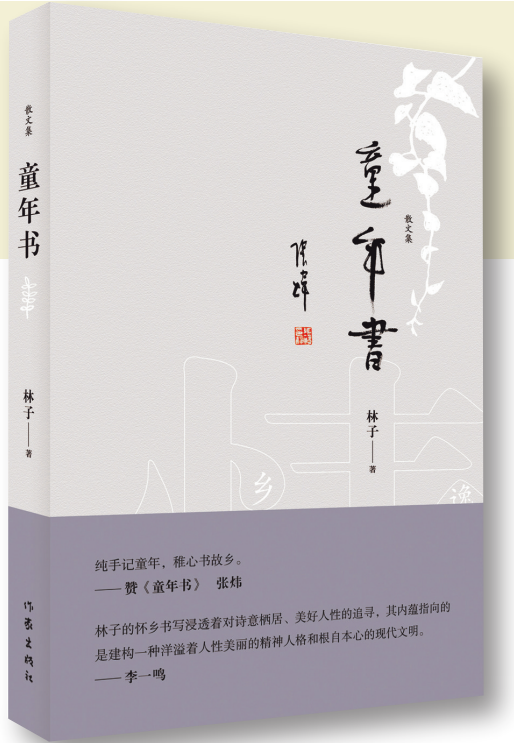


路在脚下,光在前方

——读《童年书》□李一鸣



故乡、自然、成长,是林子散文的三条主线。怀乡是中国散文自古而今的一个重要母题。以现代散文而言,篇名以“还乡”为关键词的名篇,就有郁达夫的《还乡记》《还乡后记》,倪貽德《岁暮还乡记》,何其芳的《还乡日记》,茅盾的《还乡记》等;以“故乡”为题的散文,则有周作人的《故乡的野菜》,舒新城的《故乡》,茅盾的《故乡杂记》,李辉英的《故乡的山梨》,黄天庐的《忆故乡》,丰子恺的《故乡》,鲁彦的《故乡》,傅东华的《故乡散记》,紫紫的《故乡是只烂桔子》等等;写过《乡愁》《我的乡愁》等题目的游记散文作家则有罗黑芷、倪貽德、叶灵凤、茅盾、柯灵等。

故乡是什么?文学评论家鲁枢元曾经深情叙说:“故乡是一块自然环境,是天空,大地,动物,植物,时光,岁月;故乡是一支聚集的种群,是宗族,是血亲,是祖父祖母、外婆外公、父亲母亲、邻里乡亲、童年玩伴、初恋情人;故乡又是一个现下已经不再在场的、被记忆虚拟的、被情感熏染的、被想象幻化的心灵境域。”事实上,由于中国有数千年的历史时期处于农耕社会,生命与土地的密切联结沉淀在人们心灵深处,便形成了安土重迁的心理结构,并潜滋暗长为中国人的“集体无意识”。中国现当代作家大多都有乡村背景,伴随现代社会的发展,他们走出故土、步入他乡,传统与现代、城市与乡村、理想与现实、感性与理性的矛盾,撕扯着他们的情感和灵魂,故而使得他们心灵深处的恋土思乡之情,如许强烈而深厚。

心有千千结,故乡梦中来。于是在林子的散文里,我们便看到她对故乡的苦恋。一场腊月小寒节气的雪花,她的笔下也充满温暖的忆念:“起初雪并不大,纷纷扬扬的,落在黄土高原上,随即渗入泥土中。空气很清新,湿润润的;沟涧梁峁枯干的荒草,被雨浇成了褐黑色,却又有一种湿润的柔软;路边的树杈上,已积起一指厚的雪茸。正在冬眠的树叶和花蕾,做着甜美香甜的梦,风儿似乎也睡着了。”塞北的凛冽,经了游子

的心灵过滤,竟有了江南风景才有的“清新”“湿润”“柔软”“雪茸”,那“做着甜美香甜的梦”的岂是“冬眠的树叶和花蕾”,那是怀念故乡的人啊。

于是,我们看到她对故乡的痴情描绘:“老人家过年热闹而繁忙,一过腊八节就开始泡豆子生豆芽,绿豆黑豆两种皆有,到这会儿豆子应该已发芽了。接下来的日子,就拉开了忙乎过年的序幕,清扫卫生、磨豆腐、蒸花馍米窝窝、炸油糕、做摊黄、剪窗花、写春联、挂红灯、买新衣服、买年画、买花炮……”普普通通的风俗,在时间远去、空间远隔的回望里,有了多少浓浓的情味、悠长的滋味和深长的意味。

当然,怀乡最念是亲人。四五岁时,母亲离去了,“我”成了“父亲的尾巴”。“记忆中的县政府会议室摆放的是长条木桌木凳,我紧挨着父亲坐在长凳上,脚还够不着地,胆怯的眼神儿根本不敢环顾四周。开的什么会我不记得,只记得我坐在那里一动也不敢动,一会儿就呼呼地睡着了。”带着小小女儿去县政府开会的父亲,会受着怎样的为难,仅仅是因为不敢让女儿一个人待在招待所,便连哄带劝,带着女儿去开会。懵懵懂懂的

女儿不顾父亲的脸面,一气之下撒腿跑出会议室,父亲则“紧跟着追”“边撵边喊”,当父亲好不容易追上女儿,女儿“已做好挨揍的准备”,“但父亲没揍我,只是紧紧抓住我的手,一起向街上的小摊走去,带我买了一撮扭丝饼”。虽是平朴的叙事,不事雕琢的白描,但一个备受生活折磨却真心疼爱孩子的父亲形象,在纸上、在读者心上立了起来。“我”贪睡赖着不想上学,被父亲一把从被窝里拖出来,等“我”到了教室,父亲却跟来,“帮我把布衫套在了背心的外面”,又递给“我”一个用书写纸包着的热乎乎的鸡蛋饼。当“我”离开家乡到省城上学,“从复试到开学报到,都是父亲领着我,坐七个小时的长途汽车颠簸到校”……父爱温度,人间至情,于此得之。“在我小时候,一直是父亲的尾巴,多想父亲老了,让他跟着我,当几年、十几年女儿的尾巴啊!”“但还没有等到我尽孝时,父亲却匆匆地走了。”最真的深情,最深的遗憾,却淡语出之,尤显沉痛。

林子的怀乡书写,无论是对故里景色的热切追忆,还是对家乡风俗的真切描绘,无论是对故乡的情感倾吐、心灵倾诉,还是深切独语、自我表白,都充满对纯粹生命、纯净人生的向往,浸透着对诗意栖居、美好人性的追寻,其内蕴指向的是建构一种洋溢着人性美丽的精神人格,一种摒弃纷争、根自本心的现代文明。

在林子的散文创作中,山水自然书写也是重要组成部分。人与自然的关系,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关系。先秦时代,老子便将“自然”作为其道学思想体系中的核心概念,“人法地,地法天,天法道,道法自然”。其中的“自然”既是哲学概念,意指宇宙万物运动变化的最高法则,又体现为现实的自然山水,庄子则在《逍遥游》中传达了孜孜追求“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”的自由体验的情怀。魏晋人把老庄抽象的“自然”之道转化到外在的“山水”之间,在他们看来,“美不来自于道,不来自于任何外在的他者,美就在于感性事物自身”。人在自然世界中和谐自得,在大化流

行中自然而然地运行。到了唐代,唐朝人的山水意识亦突出强调人的本体与山水本体的合二为一,追求物我相亲、物我合一的审美理想境界。在宋代,山水关系已不存在主次之别,而是对应相亲关系,人从形体到心灵都融化于山水之中,获得心理的平静和灵魂的安宁。中国传统文化融入自然、亲和山水的思维,蕴涵着中国人的精神追求和情感寄托,经过历代文人雅士的不断充实、不断注入活力,得以丰富发展并沉积下来,终于汇入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脉系。在林子的散文中,人是自然的产物,自然是人类的摇篮,人类只有回归自然才会寻回天性;而自然一旦进入人的视野,便被赋予人的色彩,“自然的人化”与“人化的自然”,统一于人类融入自然的精神向度和美学创造。

在《下乡在邹平》中,她饶有兴趣地描写眼中的风景:“邹平的小鸟相当多,仿佛此地的山水人文对它们有着某种吸引的力量,各类山雀、云雀以及从来没见过的鸟飞来蹦去,到处遨游,并各自吐露着不同的乡音。这些时而来自树端,时而来自水面,时而逼近,时而遥远,随着或远或近、或高或低产生出不同音质的鸟鸣声洒落满地,真是千声万籁,喑然大观。加上水的润泽,风的鼓动,清晨的诗意便蓬勃升起。”在这里,山水自然激发作家情感,作家赋予山水自然以灵性、人格,作家身心完全融化于自然,并在自然之美中神思畅游,在关于鸟的乡音的幻化中达到“眼中风景”与“心中风景”和谐、人情与物景交融的境地。“登上山顶俯瞰,天空碧澄,一尘不染。随着太阳的升起,鸟雀似乎比清晨谦逊了几分,把青翠的啁啾声调得低了一些,柔了一些,稀疏了一些。它们轻逸的身影,点缀于枝叶间草丛中。蝉声随之漫涨,一蝉独唱,万蝉齐和,鸟鸣被一波一波的蝉声覆盖,如微雨缠绵,犹丝竹乱耳。”作家心灵与自然鸟雀处于冥合状态,人的内心世界、生命情致与山水自然形成了一种意趣深远、回味无穷的呼应。在作品中,作家绘写故乡的山水景致:“小

时不识节气,从山的变化读出四季交替。当山下积雪融化,褐色山体显露出,绿色慢慢攀上山顶时,是春天来了;当山顶的银白色向山下蔓延,给山体盖上雪白的棉被时,冬天到来了。对于我来说,四季就是山的变化。”作家于此把山水当作生命中的“家山”“家水”来描写,山水的“空间”与四季的“时间”如此相互契合,“自然的诗化”与“诗化的自然”达到双向互构,人与自然实现内外和谐统一。当然,作家强烈的主体意识使“自我”不是消融隐没在自然山水中,而是使山水自然积极地表现着自我,在“天地与我并生,万物与我为一”的体验中,生命得以与自然融通,山水实现与自我合一,从而提升了文学对山水自然书写的境界。

林子的作品也展现了作家的成长史。散文本是作者精神的载体,散文写作是作者个体生命经验最自如的倾诉与表达。它饱含作家对自然界、人类社会等客体世界的深刻体验与揭示,更是作家心灵的真实“自传”。郭沫若曾宣称,“文艺是出于自我的表现”,“文艺的本质是主观的,表现的,而不是没我的,摹仿的”。李素伯认为,文学名著都是“作者最真实的自我表现与生命力的发挥,有着作者内心的本相”。事实上,自我表现是作品的生命,散文作品呈现着作家的生活成长史和精神成长史。林子的散文贯通着自己的成长:孩童时母亲离开的孤独,上小学时心灵的遭遇,读中学时三十里山路的奔波,进入技校时想家的急切,恋爱时父亲的叮嘱,随军的艰苦生活,跨省调动的人生转折,到基层锻炼的心路历程……时间改变了生活,时间创造着生活,时间就是生活。

“行走在那条路上,感觉到来自大地深处的那种无法表达的力量感,会觉得心中的信念正在与大地产生共鸣,指引我通向更广阔世界的一条路。”是的,这条路连接过往,也通向未来,承载生活,也背负文学。林子,永远保持出发的状态吧,路在脚下,光在前方!

眼睛读懂诗意还不够

——《九诗人:俄罗斯的太阳与月亮》序□范行军

——
2015年和2018年,同在8月,先从沈阳,后自北京,两次启程,行走俄罗斯,行程3万多公里,一路虔敬。就像抵达莫斯科的次日,乘车4个多小时前往图拉州“明媚的林间空地”雅斯纳亚·波良纳,面对绿草从中“世上最美的墓地”,不由自主地跪下。虔诚不为一人,是对这片精神家园的眷念。

眷念一旦践行,迈出的每一步都有新的感知。在特别恰科夫美术馆,画像上的普希金,没有我在克里姆林宫看到的那个背影更真实;在凯旋广场,高高在上的马雅可夫斯基,不如我在芬兰湾惊涛拍岸处见到的“22岁”更俊美;在铸造厂大街的书店,叼着烟斗的叶赛宁与安格列杰尔酒店墙上那块“断裂”浮雕叠在一起,定格了生死一瞬间;在鲍里索格列布巷6号,茨维塔耶娃隔路相望故居,“如果灵魂生来就有翅膀,它不需豪宅,也不需草房”,更显苍凉;而当我从塞瓦斯托波尔的南边跳进黑海,“野丫头”阿赫玛托娃也在水里拥抱波涛,就像她拥抱着痛苦与光荣。涅克拉索夫、吉皮乌斯、勃留索夫、勃洛克、别雷、帕斯捷尔纳克、曼德尔施塔姆、布罗茨基……每次不经意或是特别的遇见,都是与历史、时代与诗的相遇,更是与自己相遇。

当我谈论俄罗斯的诗人时,我是在谈论我自己。现在,再加一句:眼睛读懂诗意还不够,行走的坎坷更靠近人生和命运。
二

所以我不会颂扬“俄罗斯诗歌的太阳”,在克里姆林宫“炮王”和“钟王”处,他那一闪而过的落寞和孤独化作认知:没人可以不为自由付出代价,甚至自尊。

“如果你12月14日在彼得堡的话,你将会做什么?”尼古拉问。
“我将会和造反者一起出现在参政院的广场上。”普希金回答。

1826年9月的那个下午,尼古拉又问诗人:“你的思考方式是否有所改变?是否能够保证今后改变行为,如果你将你释放的话?”诗人犹豫了很长一段时间,最后向沙皇伸出了手,发誓会有所改变。于是尼古拉和普希金从房间里走出来,对等候在外面的大臣们说:“先生们,这是我的普希金!”这一刻令人欲哭无泪。我甚至为“偷窥”了诗人的“另一面”而愧疚。

但是帕斯捷尔纳克将我从这一情境中拽出。他比我更深刻地理解了普希金,理解自由与生存:就这样,前进,不必战栗,把同类现象当作慰藉,当你还活着而非一具圣骨,人世间何曾对你有过怜悯。

这并非是为过错寻找退路,而是在冷眼直面艰难时世时所持有的态度:何以能够活下来?答案是与诗共存。帕斯捷尔纳克让自己深陷尘埃,感同身受前辈的困境。他的尊重即是善待。

所以在舍列梅捷夫宫后花园,看到曼德尔施塔姆和阿赫玛托娃在一起,我根本不会去想:帕斯捷尔纳克为什么不在这里?其实在阿赫玛托娃最困难的日子里,大部分熟人都绕开她十条街远,是他依旧频繁地与她会面。如果挑剔他是“住别墅的人”,如何读得了《日瓦戈医生》?而他安息在别列捷尔金诺那块偏僻的墓地,不像沃尔科夫公墓的勃洛克、新圣女公墓的马雅可夫斯基、瓦甘科夫公墓的叶赛宁,总有人献上鲜花,也绝不会介意。

“我快乐。”他最后说。

三

行走,也是一次自我放逐和流浪,最后返乡回到精神的伊萨卡岛,就像我在普希金的家,在阿赫玛托娃的家,在茨维塔耶娃的家……

走过舍列梅捷夫宫后花园,走上阿赫玛托娃家的楼梯,步子沉重,伴随着她疲惫的喘息。挨近那些破旧的锅碗瓢盆,还有一只有裂纹的碗、一条白色的披肩、一把破旧的椅子,它们都是带着温度的,连接着诗人的痛苦和寒冷。一盏马灯也被点燃,光亮中,诗在前行。而当我走近一面镜子,和勃洛克、古米廖夫、曼德尔施塔姆、茨维塔耶娃在一起,就再也无法是一个旁观者:“这就是我的生活,我的传说/有谁能拒绝自己的生活呢。”

走在铸造厂大街,已经遇见了涅克拉索夫和叶赛宁,我就想:会不会又相遇帕斯捷尔纳克和马雅可夫斯基,他们结伴在此悠长地散步。还有勃洛克,还有古米廖夫,还有曼德尔施塔姆……他们不再是俄罗斯的诗人,而是同行者。

不错,在布罗茨基故居楼下,我分明看到1972年,他在离开故乡前站在二楼阳台上,脸色沉郁。我听说,“从这个阳台上,我们可以看到整条街道”。于是我看看这边,又看看那边,丝毫不感陌生。如果说诗人的诗进入了我的生活,不如说是我的脚步走上了诗人的道路。没有无缘无故的追寻。我不喜欢冒险,绝不会看到他在跋山涉水。千里迢迢来到这里,我不是一个局外人。我声明:当初把诗人赶出家门的是列宁格勒,而我也它是它的一员。

诗人是一面镜子,不要指望只有光鲜的一面对酒当歌。在镜子背面,月有阴晴圆缺。当我来到布罗茨基家的后院,看到城市另一面的同时,也就看到了光环的另一面。

作诗法与做人法是一样的:少些“形容词”,多些“动词”。

四

从波罗的海到黑海,从芬兰湾到福罗斯湾,

从莫斯科河到涅瓦河和丰坦卡运河,从阿尔巴特街到涅瓦大街,从马雅可夫斯基地铁站到莫斯科大学,从基督升天大教堂到主显容大教堂,从冬宫广场到普希金文化广场,从舍列梅捷夫宫后花园到姆鲁济大楼后院,从皇村到青铜骑士,从十二月党人广场到“流浪犬”俱乐部,从普希金路到莱蒙托夫路,还有叶卡捷琳娜堡、特维尔、列宾诺、雅尔塔、塞瓦斯托波尔、亚美尼亚、巴统、敖德萨……我在九诗人住过的地方、到过的地方行走与遥望,沉思又默想。他们徘徊之地,我徜徉。他们回不去的故土和祖籍地,格鲁吉亚、华沙、圣彼得堡、莫斯科、梁赞、米哈伊洛夫斯克村……我能去的,替他们回看;我不能去的,带他们瞻望。那棵树依然洁白,稠李花依然如初,奥卡河水依然清澈。

我看到的,更多的是他们依然和历史在一起,和时代在一起,和今天在一起。

普希金呼唤自由的声音,不只是十二月党人的呐喊。

勃洛克从“美妇人”处转身面对苦难的大地,痛苦与深情动人心魄。

马雅可夫斯基坦言“我的灵魂里没有一丝白发”,是如此干净和俊美。

叶赛宁痛哭“我是乡村最后一位诗人”,这是一曲忧伤的挽歌……

诗人的命运,无不是俄罗斯风云变幻最为生动的映照。

而诗人虽死,诗歌获得新生,且流浪得更远,仿佛还有“放心不下的事情”。

五

“一切都不寻常,一切都不一样。”默念着帕斯捷尔纳克的新文字,我行走在墓地之间。

那天在新圣女公墓,为了寻找象征派诗人别雷的墓地,在一个区域转了好几圈,最后看到的墓碑比想象中矮很多,旁边那棵橡树倒是又长高了。这之后,看到了寂寞的勃留索夫,就像1923年12月17日,莫斯科大剧院为诗人庆祝50寿辰时,这位象征派领袖备感孤独。前来恭贺的诗人很少有人发言,帕斯捷尔纳克朗诵了献诗:

我祝贺您,一如这场合
祝贺自己的父亲那样。
只可惜大剧院里没人会
把草席铺向脚边般铺向心房。

我是通过诗人的生卒年“1873—1924”找到墓地的。我想说他活得太短,可3年前离开的古米廖夫比他还小,1年后离开的叶赛宁又比古米廖夫还小。我看看墓碑,想到了圣彼得堡的沃尔科夫公墓,另一位象征派巨匠勃洛克。诗人生得高高大大,墓碑却修长清瘦,如他所预言的“一个骨瘦如柴的鬼”一般清瘦与挺拔,是不屈服于命运的清瘦与挺拔,是孤傲、是清寂。在他南边,著名的文学家之角,屠格涅



夫、冈察洛夫、库普林……相伴而居。但看着他,刹那间我则更理解了“比水还静,比草更低”,多么显赫一时的,都将随时间的流逝留在历史中,但静水流深,璀璨永存。

“黄金时代”的茹科夫斯基、普希金、丘特科夫、果戈理、冈察洛夫、莱蒙托夫、屠格涅夫、陀思妥耶夫斯基、托尔斯泰……光芒四射。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“白银时代”:象征派、阿克梅派、未来主义、意象派……群星闪耀。这一百余年,是俄罗斯文学的鼎盛嘉年华。如果说自克里米亚战争失败,俄罗斯帝国荣誉不再,文学开辟的疆域却是繁荣昌盛,诗歌更是光芒万丈。

那么,这与我何关?

关系甚大。
我明白,不论我怎样热爱俄罗斯的诗人,也不可能成为诗人。也许在内心深处,我原本是想成为那样的人,这与自不量力无关,关乎愿景。如今,愿景以另一种形式呈现:我跨越,我奔跑,我行走,去遇见坎坷和诗意,遇见苦难和梦想,遇见命运和光荣,从而认知丰富的世界。丰富包括着不完美,而正是不完美,让我每每急坠之下,得以抓住飞升的翅膀。站在波罗的海岸边,我想起波兰诗人扎加耶夫斯基所说的,“尝试赞美这残缺的世界”,看淡了一路的不顺。

每一次跟随诗人的脚步,都能对生命给予一次清醒的判断,尤其是自信。布罗茨基是这么说的:“一个阅读诗歌的人要比不读诗歌的人更难被战胜。”而我更是从诗人身上获得了难以被战胜的力量。

六

“在风格打破的时刻,再造的是我们自己。”如果这是叶芝说的,那我就更相信,帕斯捷尔纳克的晚期风格,就是“智慧诗人”王冠上最后也是最惊艳的荆棘。

帕斯捷尔纳克一边写诗,一边完成了处世策略。他笃定:“谁注定活着受夸奖,谁理当死后遭

辱骂。”于是,该放弃的放弃,该坚守的坚守。年轻时放弃音乐、放弃哲学、放弃莫斯科大学的毕业证书,36岁时放弃三人通信的主导地位(与茨维塔耶娃和里尔克),再后来放下诗歌,转而翻译莎士比亚的悲剧、歌德的《浮士德》,直到1958年放弃诺贝尔文学奖。他在寒意深秋提醒自己,“何必惊慌:惶恐之际眼睛自会睁大”,又能明了“造物的法则不足为信,美满童话一样是骗局”,然后面对“盛大而庄严的寂静”:

白皑皑的死的王国,
心神不定地陷入战栗,
我悄声向它低语:“谢谢,
你的惠赐,多于对你的祈求。”

我会为他晚年的语言之回归自然而打动,但不会简单认为是岁月沉淀使得诗风发生改变。我倒愿意相信,诗人无心精雕细刻,或者说诗人放弃早期丰富的联想、连绵的意象,选择简单,乃是身心不胜重负。毕竟他所处的是一个令人不得不“怀着犹豫前行”的时代。如果说象征派老诗人安年斯基会发出“请告诉我,在思想的痛苦之中/是否还有谁会怜悯我”的慨叹,那么帕斯捷尔纳克则是在“黑夜在胜利,王和后在退却”之时,还能“看到早晨”的醒客。他“已不在乎,反正我不会离错误而去”,而且更笃信:“本来,人世间就没有/冰雪无法治愈的忧伤。”

正是理解了帕斯捷尔纳克,我才更理解曼德尔施塔姆。与其说我是在一遍又一遍地诵读《沃罗涅日笔记》,不如说我是在一次又一次地触摸。它像块石头,摩挲久了会热。恐惧、颠沛流离、孤独、饥饿、寒冷,不自觉地改变了他的诗风,从内容的沉郁、苦涩、撕裂、抗争,到不拘形式的跌宕、停顿、散漫放肆、漫无边际。流放将《沃罗涅日笔记》磨砺得粗糙、硬、尖利,触角对接着风,对接着黑夜漫漫。诗人不见了阿克梅派那种古典的“高峰”和“乡愁”意味。也许布罗茨基说得不错,“他有太多东西要说了,根本就顾不上操心他在风格上的独特性”。沃罗涅日之于曼德尔施塔姆,更如卡明斯基所言,“进入这些镣铐,就是进入了自由”。

谁说不是,自古罗马的奥维德被放逐到莽荒的黑海岸边,凡是流放地,诗都获得了深邃和辽阔。

诗人风格的改变,也改变了我。看过他们的纪念碑,走进他们的故居,拜谒他们的墓地,回望抑或前瞻,人世都将是另外一个样子。行走俄罗斯,不是两次,不是遇见九诗人,不是3万多公里行程,不是几十万字记录……而是行走,就是行走,已然改变了思维和生活的轨迹,获得精神再造。

再说一遍:眼睛读懂诗意还不够,行走的坎坷更靠近人生和命运……

(摘自《九诗人:俄罗斯的太阳与月亮》,范行军著,作家出版社,2022年11月)